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道路丛书·译丛

国家发展动力

Dynamics among Nations

[美] 希尔顿·L.鲁特 (Hilton L. Root) 著

刘宝成 译



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处于共生、共享和共同竞争的网络中，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治理趋势和联盟的嬗变。这再一次证明，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民主发展，并没有一种最佳模式可供复制，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正根据自身情况和历史经验谱写属于自己的现代化乐章。

中信出版集团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道路丛书·译丛

国家发展动力

Dynamics among Nations

[美] 希尔顿·L.鲁特 (Hilton L. Root) 著

刘宝成 译

中信出版集团·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发展动力 / (美) 希尔顿 · L. 鲁特著 ; 刘宝成

译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8.9

书名原文 : Dynamics among Nations

ISBN 978-7-5086-9362-0

I . ①国… II . ①希… ②刘… III . ①世界经济—研
究 IV . ① 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8404 号

Copyright © 2013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国家发展动力

著 者 : [美] 希尔顿 · L. 鲁特

译 者 : 刘宝成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25 字 数 : 295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6-9499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9362-0

定 价 : 6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中国道路”丛书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主任：孔 丹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耘 马 戎 王小强 王绍光 王海运 王维佳

王湘穗 方流芳 尹韵公 甘 阳 卢周来 史正富

冯 象 吕新雨 乔 良 向松祚 刘 仰 刘小枫

刘瑞生 刘纪鹏 苏 力 李 玲 李 彬 李希光

李若谷 玛 雅 周和平 杨凯生 杨松林 何 新

汪 晖 张文木 张 宇 张宇燕 张维为 陈 平

陈春声 武 力 罗 援 季 红 金一南 周建明

房 宁 赵汀阳 赵晓力 祝东力 贺雪峰 聂庆平

高 梁 黄 平 黄纪苏 曹 彤 曹和平 曹锦清

崔之元 梁 晓 彭光谦 韩毓海 程曼丽 温铁军

强世功 蒲 坚 熊 蕾 潘 维 霍学文 戴锦华

“中国道路”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孔丹

编委会执行主任：季红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海龙 王晓泉 王湘穗 玛雅 张宇 张桐

欧树军 祝东力 高梁 陶庆梅 黄平 彭光谦

韩毓海 强世功 鄢一龙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实践中，努力寻求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崛起。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们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中一些有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并邀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编辑和出版反映与中国道路研究有关的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

“中国道路”丛书的定位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

进立足中国实践、通达历史与现实、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推动和传播。

“中国道路”丛书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历程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受挫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和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时因应世界的变化。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从来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而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中国道路”丛书将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例如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和截然对立的评价；例如极力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因而，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

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道，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应该成为致力于中国道路探讨的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积极促进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研究，那些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学术新风。我们相信，通过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会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

“中国道路”丛书具有跨学科及综合性强的特点，内容覆盖面较宽，开放性、系统性、包容性较强。其分为学术、智库、纪实专访、实务、译丛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涵盖不同类别，例如在学术类中就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

这是一项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界理论创新观念不足等现状是制约因素之一。然而，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

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与了解中国国情，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担当精神的中国学派，共同推动这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工程。

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勇于承担大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信将以历史担当的使命感，来持续推动中国道路出版工程。

2014年8月，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平台，凝聚力量，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携手中信出版社共同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顶层设计。

“中国道路”丛书的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将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努力使“中国道路”丛书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孵化器，中国学派的探讨与交流平台，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传播思想、凝聚人心的讲坛。

孔丹
2015年10月25日

| 中文版序言 |

中国经济转型的驱动力

倘若中国一直对外闭关锁国，于内讧乱扰攘，史学家将见证又一文明古国的衰落；假如中国急于事功，模仿苏联的休克疗法，实施颠覆性的改革，泱泱华夏仍将沸反盈天，朋党林立，寡头横暴征利，贪贿公行，剧作家乐得采撷丰富的素材予以揶揄讥讽；再或中国合盘西化，舶来民主，放任市场，西方政治经济学家虽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但谁能有足够的智慧为其指点江山，确保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均衡发展呢？难道有着类似封建历史和庞大人口的邻国印度就是他们为中国力荐的楷模吗？殊不知，世界银行的数据已经显示，就在 1978 年中国改革初始之时，中印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尚且不分伯仲，而光阴荏苒，历经近四十载国家的励精图治，人民的奋发图强，中国卓然跨入了持续高增长的轨道，2016 年已领先于印度 5 倍之遥。这起码让两类从事转型研究的经济学派百思不得其解，一类属于宏观经济学派，另一类属于制度经济学派。其实，二者为转型政策开具的处方不外乎：私有化，自由化，对外开放，体制改革，依法治国，技术外溢，等等。

在经济转型问题上，宏观经济学派将新自由主义奉为圭臬，强调通过结

构调整来对冲周期性危机，以放松管制后的自由市场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及持续增长，因此往往诋斥政府在经济规划、产业布局、基建投资以及企业所有制中发挥的主导作用。显而易见，中国对这样的发展战略一直保持质疑的态度。首先制度经济学会质疑，如果制度安排偏离了广为认同的公理，则社会势必乖舛迭生，政策改革无异于徒托空言。平心而论，为了自圆其说，那些程式化的经济理论都必定以建立超脱现实的假定为前提，并且在复杂的现实当中抽离出为数有限的变量，然后便可套用计量模型予以对比评说。分析过程是通过对比找出现行实践和所谓的最佳模式之间的差距，然后建议在要素配置或制度设计方面进行补苴罅漏。他们往往信誓旦旦，坚称如果一切都按照其框定的模型运转，那么转型中的市场就能尘埃落定，大致接近其他成功经济体的模样。这种强加于人的方法为中国的体制改革设定了一个目标——将其转变成为与其他西方国家相似的市场经济体。

中国的改革家虽然对各种治理和经济理论采取了包容的态度，甚至鼓励中外学者百家争鸣以便择善而从，但他们深知，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可以指导中国进行转型。照搬西方的教训殷鉴不远，推翻封建帝制并剪掉辫子的民国时代，选举制、总统府、内阁制、参众两院，各色民主建制一应俱全，但结果依然是军阀势力和阴鸷权奸横行朝野，假托民主之名争相为民做主。20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黄花凋零，而作为其中一员的中国，在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后，不仅走出了百业凋敝、积贫积弱的窘境，而且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中国把邓小平崇奉为改革的总设计师，并将其言论和做法总结成“邓小平理论”写进了宪法，但即使是他本人也承认改革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模式。不过，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一点，那就是“实事求是”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没有简单照搬西方模式，因为他们更加了解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和差异，所以能够从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出发，务实地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他们认定，改革必须顾及所有参与者的承受能力，只能渐次推进，由点及面，贪功冒进势必会适得其反。

中国的改革家以遵循常理和实干精神回答了制度经济学派通常忽略的一个问题：在基础能力尚且处于低位的情况下，工业化将如何实现？换言之，面对羸弱不堪的生产力和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遽然的结构转型和制度变革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管子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果敢的领导者不会坐等万事俱备而贻误时机，而是把经济改革视为一个循序渐进、不断试错的过程。不少人将如今的贫富分化归咎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这种说法失之偏颇，因为公允的评价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也忽视了改革决策者的初衷。改革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来注入新的动力机制，希冀先富起来的人能够带动后进的人，最终共同创造一个繁荣而公平的社会。但是，“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通过推行市场经济和参与全球分工而迅速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而与之隔岸相望的深圳当时还是一个人口不过3万的小乡镇，如此巨大的反差足以令当时的中国领导者痛心疾首；而更为严峻的是，以安徽省小岗村为代表的人民公社的广大农民还在流离乞讨，广大市民仍然依靠各种票证维持最基本的生计。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任何的改变都意味着改善。但是，面对意识形态上的巨大惯性，特别是在取得成效之前，改变不仅需要打破僵局的勇气，而至关重要的是，需要在各种势力当中展示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正所谓，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因为过程一般是难以预料的，而关键在于结果。国之将兴，必听于民。他们期望以经济增长为先导，以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动力，缓缓牵动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在法治建设领域，与其搭建浩繁的法制体系，还不如首开商业之条规，以应市场及契约所急需。全面创设比肩西方的法治环境，绝非一代人所能完成的目标。况且，中国领导人

审时度势，并未合盘照搬或嫁接西方的理论和模式，而是建立了一种兼收并蓄的混合体制，因为他们一方面必须正视本国的历史和现实，另一方面要在既定的全球贸易体系中寻找发展机遇。他们无意引进资本主义，也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是要在风云变幻中力挽狂澜于既倒，复苏中国经济。他们没有冒进速成，而是适时调整了自身的定位，重新回溯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又扩大了社会主义的概念内涵，以顺理成章地接纳与资本主义相通的市场经济。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前进，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

在此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没有旧例可循，其结构是通过多种势力的交互博弈逐步演化而成的，类似于19世纪英国的维多利亚工业经济。这种前进的步伐和节奏仍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每一项新的举措都可能引发新的变化，在百端待举中激起意想不到的波澜。饶有意思的是，中国成功之路恰恰在于其领导层没有固守既定章法。他们意识到，唯有通权达变，才能与民更始，除旧布新。这体现了先哲孔子的智慧：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混合经济之类的概念，深刻印证了中国特有的哲学思辨。相对主义，而非绝对主义；实用主义，而非经院主义；功利主义，而非平等主义；渐进主义，而非激进主义……在两相对比当中，中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初见成效的改革进入一个当今学者号称的正态反馈回路。决策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动员全国上下解放思想，突破剩余价值论，这为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营利行为赋予了合法性，为劳动力大军的市场化就业体系确立了框架；土地包产到户，工厂承包经营，城市住房商品化，绩效工资制，种种举措均突出了一个极其明确的目标：解放“无形之手”，奠定市场经济的基石。

在运用市场分配原则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之后，消除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仅仅依靠价格改革来消除“剪刀差”或者由中央

进行补贴或转移支付，很难实现根本性的改观。在美国，林肯为了解放南方的劳动力，使之进入北方勃兴的制造业，不惜以发动内战为代价。而中国则只需一声令下，鼓励农村人口外出务工，调动亿万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和沿海地区，就收到了一举多得的功效：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商业制造充分利用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农民工带回家乡的不仅是额外的收入，而且是信息、技能和创业的机会。在改革过程中，中国遵循了效率优于公平的原则，没有阻止劳动力资源的流动，而且使其流动更具有明确的经济性。

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向西方国家或国际组织求援。领导层一旦认定了需要达成的目标，他们便千方百计，根据自身实际的社会能力来制订解决方案。在全球经济中抓住机遇，起点永远是自身现有的能力，这使中国得以摆脱国际社会的指手画脚，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道路。其转型过程既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空想，而是超越了支撑这两种模式的机械主义观念——经济是一个可以规划和控制的实体。他们对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忠告一笑置之，认为市场和国家的界限不必畛域分明。改革的进程是一种在黑暗中的摸索，按照邓小平的原话，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没有现成的制度可以模仿。与其徒费口舌，争论究竟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非意识形态的评判标准，即“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改革方法和目标被写进了1999年的中国宪法，称作“邓小平理论”。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一个关键在于，邓小平允许一些地方或行业先行先试，在取得成功经验之后，总结成一种模式向全国推广。不同的模式可以在多个地方或行业同时试验，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方法有利于调动市场的力量来加速转型。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合作社以及之后的人民公社构成了农村的主要生产方式。改革之初，国家并没有立即取消上缴公粮的制度，而是允许家庭

留存或销售剩余的产品，于是在保障国家粮食储备的前提下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不到两年的时间，农业生产激增，公社体制下罕见的瓜果蔬菜在全国范围内铺满了路旁和街边的小店。

中国没有急于通过私有化来大面积地消灭公共企业，而是将其由国营变为国有，逐步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开来，引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并鼓励部分国有企业通过上市变为公共公司，从而接受机构及股民的监管。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形成了三股经济力量——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交相竞争的格局。实践证明，贴近市场的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蓬勃发展起来，它们的地位也由国民经济的补充上升到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做法容忍了意识形态的惯性，因而避免了大举私有化带来的社会震荡和政治风险，降低了改革成本，实现了改革的平稳过渡。

另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是发展乡镇企业，这是一种集体所有制经济实体，它对于解决社会基层就业和制造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显然是一种明智的创举，因为在转型的过程中，由于中央政府控制的资产比例在逐步下降，税基也相应地收缩。将基层的社会服务职能交给乡镇企业，政府不仅减少了财政支出，而且为这些企业增添了市场活力。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生产性功能采用了单位的组织方式，管理者无须关心市场和利润，工人端着“铁饭碗”，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乡镇企业就是这些基层生产单位走向公司化的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的公共功能和地方政府对管理的参与逐步淡化，乡镇企业也彻底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如今，乡镇企业这个名称渐趋退出了历史舞台，它们要么发展成像海尔一样的大型上市公司，要么在发展中被一些中外大公司兼并重组。

尽管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公司化经济实体，但政府从企业征收的税收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远远低于美国，仅相当于法国和瑞典的一半。实际上，政府通过征税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低于任何西方的市场经济体。

另外一种有别于西方教科书的做法加速了中国的转型：土地政策。土地的所有权始终掌握在政府手中，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允许农民和地产开发商按照一定的期限向政府租用。如此一来，政府保持了支配土地的灵活性，避免与使用者陷入旷日持久的谈判，可以随时为了全局发展的战略目的征用或收回，用于建设工业园区或者修筑高速公路等，这是中国得以在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突飞猛进的一个重要优势。当然，地权的不确定性也刺激了农民急功近利的行为，过度地施用农药和化肥不仅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也破坏了土壤的肥力；野蛮拆迁加剧了民众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不能正确履责，且缺乏与民众的沟通能力，这构成了激化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改革时常因不够放开而招致诟病。批评家指出，改革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型，而且，一旦社会剩余有所积累，既得利益集团则会挟私掣肘，阻挠改革进程。中国的决策者遇到的问题都是无章可循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兼收并蓄的做法更有利于减小改革的阻力。随着改革的推进，他们开始认识到，市场经济原本就没有固定的模式，它并不完美，但很有用。时移势易，解决问题的体制和机制等手段必须与时俱进，在不断摸索中创新。即使初步的改革方案已经出台，也不妨因地制宜，随时进行调整，再以优化的版本进入二次试验，直到形成更加完备的体系。另外，指责中国改革发展毫无规划是缺乏根据的。最为明显的，虽然中国政府每五年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属于计划经济的遗产，但中国的领导者能够吐故纳新，不断充实和更新内容，不仅为今后五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设立了诸多切实可行的量化指标。当然，在执行过程中，期待中国的政策具有很强的可预见性，也是不现实的。

在上述所有的举措中，中国的转型过程超越了传统的设计思路。政治领导人明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他们没有任何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由此

需要边改革边试点，抱残守缺是绝无出路的，巨大的转变势在必行，不能刻舟求剑，让旧的期待、标准和习惯束缚住手脚。在走向现代化的征程中，他们不愿意重蹈教条主义的覆辙。在强烈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他们实事求是，不盲目接受未经检验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领导者并没有偏离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1937年发表的著名的《实践论》中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①

纵观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会发现：这些国家普遍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困局。一方面，疾风骤雨式的改革可以瞬间破坏一切旧制，令人振奋一时，但在全新的制度建立之前，难免造成机阻难抚的乱局；另一方面，改革过于缓慢，则会陷入左支右绌的泥潭，改革者往往陷入骑虎难下的困境。苏联的解体成就了寡头的垄断，市场改革背离了理想的轨道，导致国力一蹶不振；精英集团滋扰改革进程的问题在中国亦愈演愈烈，庞大的政府机构体系控制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大型国有企业的内部人特权成为低效和腐败的渊藪。但是，中国的改革步伐不能简单地用激进或渐进来形容。它如何绕过了这种两难的陷阱呢？市场导向的改革之所以能够不断推进，主要原因在于改革者调动了正和博弈的动力机制，使每一轮改革都能在政治上与关键的角色保持一致，在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同时，地方政府的利益也得到了增进。企业承包机制活跃了市场，提高了企业效益；税收包干模式划定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分利界限，既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确保了中央可预见的收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